

早期汉学期刊儒学典籍的译介、传播和影响

——以《中国丛报》为中心的考察

孙乃荣

(河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401)

摘要:针对首份在华汉学期刊《中国丛报》对儒学典籍的译介,梳理并探讨了对典籍的译介概况,指出其译介动机主要是为了解并评判中国思想文化和批判中国古代基础教育。进而从译前导言、译后注释等方面分析该类典籍的译介特征以及建构负面中国形象的目的和典籍西译客观上构建了中西文化交流桥梁,展现出《中国丛报》在译介中国文化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中国丛报》;译介特征;译介影响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5-0026-05

1832年5月,由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主编的英文汉学期刊《中国丛报》(以下简称《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在广州创刊。在19世纪上半叶来华西人出版的众多英文汉学刊物中,《丛报》是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期刊。作为西方第一份以中国为报道和研究对象的刊物,它的出版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4},该刊发行20卷,约90%左右的文章都与中国有关,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丛报》。《丛报》从语言、文化、政治、宗教等诸多方面刊物记叙了有关中国的内容,其百科全书式的记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当时西人了解中国最为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

其中,《丛报》对儒学典籍的译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仅因为部分典籍是借助《丛报》首次进入到英语世界,还在于其译介特征鲜明、影响深远,并形塑出早期西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本文拟梳理《丛报》译介儒学典籍概况、特征,考察其译介传播及影响,以期为翻译史、中西交流史及汉学史等领域的相关研究做出补苴和修缮。

一、儒学典籍译介概况和动机

在20年的办刊周期内,《丛报》恪守发刊词中的宗旨:其一,介绍中国,让西方认识中国,成为有能力、值得信赖的、公认的中国权威;其二,传播

西方基督教福音,从而改造中国人的灵魂,改造中国社会^{[2]1:1}。这一宗旨始终贯穿刊物对中国文化知识的译介中。

作为新教传教士向海外宣传中国的重要阵地,《丛报》的典籍译介构成了一个重要主题,且占据了一定的比重。其中,儒学类典籍包括《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春秋》《书经》《小学》《孝经》《三字歌注解》,涉及16篇文章,多数属刊物“书评”一栏,另有部分属“文艺通告”和“历史”栏目。译者为裨治文、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和波罗满(William John Pohlman),这五人均为来华新教传教士出身。

19世纪以来入华的新教传教士,肩负着促进海外宣教事业的责任,怀有把西方文明传播到异教徒土地上的理念。他们与前辈耶稣会士有着同样传教目的,借助出版、翻译等文字工作实现其宣扬基督教义的功利性动机。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深入了解研究中国主流的儒家文化是必须的前提。在传教这一宏旨下,《丛报》译者译介儒家典籍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了解并评判中国思想文化基础

在西方欲打开中国大门进而注入基督教异质文化的背景下,了解和协调与儒家思想为主体的

收稿日期:2020-05-07

基金项目: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19世纪汉学期刊典籍英译及传播——以《中国丛报》为中心的考察”(SD181084)

作者简介:孙乃荣(1978—),女,天津人,翻译学博士,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传教士们亟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儒学作为中国自古以来的正统思想,受到历代王朝的推崇,地位之高、影响之广,是其他任何理论学说所无法比拟的。封建社会臣民行为的规范、伦理道德的树立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其影响可谓沦肌浃髓,无处不在。因此传教士对儒学典籍一向非常重视,试图通过译介封建文化的核心内容来了解中国文化特质。儒学是当时的显学,在传教士看来,儒学包含了中国的教义和实践,它已经成为中国人宗教、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特色,是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钥匙^{[3]135}。

文化对待它所能包含、融合和正视的东西是宽容的,而对它所排斥和贬低的就不那么仁慈了。传教士们在宣扬上帝才是唯一真神的同时,对其他宗教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与攻击性。作为西方殖民者的传教士,他们来到中国并非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崇拜,而是要验证基督教的普世性。在传播殖民文化的背景下,他们研究、翻译中国儒家典籍,并非真诚地对几千年中国文化所取得成就感到敬畏,而只是为了在中国典籍中,从基督教视角,搜寻儒家思想文化的缺陷,以此突出其在中国的消极影响,强调基督教的优越性。他们对儒家经典已不再如耶稣会士般持有好感,对中国传统文化少了热爱,而是普遍抱有贬低儒家文化的心理。在他们看来,儒家著作“行文混乱,充斥着无理据支撑的判断以及毫无联系、前后不一的道德准则。完整的历史分期和浮华的文风下,实则空洞、言而无物”^{[2] XV:44}。

1834年《丛报》第三卷发表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一文,以介绍兼评论的方式将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经》作为整体首次译介到英语世界。译者郭实腊系通晓多种语言的天才,他对儒家经典多有论述,认为“没有儒家经典著作及其注释的知识,就无法获得一种正确的中国知识”^{[4]63}。因此,他选择儒家学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进行评判,以证明其愚昧落后。该文通篇都充满了对儒家学说的贬损和批评,认为“内容过于琐碎杂乱、多处重复,话题老旧,令外国读者感到乏味无趣”^{[2] III:97}。他对几部经典分别予以介绍的评介,多数为负面的批评,如《大学》“引用和主题几乎无关”,《中庸》的“作者不具备智慧,堆积语录”,《诗经》“幼稚、行文矛盾,重复琐碎”,《礼记》“令人反感,风格冗长啰嗦”^{[2] III:97-107}等此

类较为密集的负面评价。

此外,郭实腊还认为《春秋》《诗经》等都无法与同时代西方的类似作品相提并论。对于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郭实腊对其思想也是诸多批判,包括《论语》崇尚的男尊女卑思想、孔子的休妻行为、孝道思想等。第八卷中关于《书经》的介绍认为“中国人从孔子身上只是学会了崇尚古风而不求甚解的创作风格,全然不顾常识与逻辑”^{[2] VIII:386-387}。这些负面言论对于秉承西方优越论的传教士而言,是诋毁儒家思想,为传教活动寻求合法理据的必需铺垫。因此,其译文中也不时夹杂着对基督教意识形态的美化,如“出于对神和人类的热爱是所有仁政和善行的基础,但他们的体制中缺少这类动机。我们也不能过多责难作者,因为他们并没有受到神启”^{[2] III:98}。

《丛报》译者在借助对儒学典籍的译介了解中国文化思想的同时,传达出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意图,以此营造出传教氛围,增强传教事业的使命感和神圣感。正如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所言:“我们如果想在国家引进一个新的宗教,就需要了解当下他们对神圣的和永恒的事物的看法,并指出他们自身体系存在的缺陷,这可以看作引入另一个体系的前奏。”^{[2] IX:76}

(二) 批判中国古代基础教育

《丛报》选译的儒家典籍中不少属于启蒙典籍作品。在浩瀚的中华古老典籍中,蒙学典籍是基于儒家典籍的精髓而衍生出的蒙童初级教育读本,专门用于启蒙识字,涵盖内容广泛,涉及伦理、历史、教育、天文等诸多方面的常识,是封建时代儿童启蒙教育的基石。此类典籍文本简练,对仗工整,且内容通俗易懂,流传范围广泛。它们历来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了解中国文化教育的最佳途径。

事实上,传教士们对中国初等教育以识字、写字为主,继而学习《四书五经》的做法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儿童所用的课本,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绝大多数内容太难,从始至终都不适合儿童身心发展,根本无法引起孩子们的兴趣也不能扩大他们的视野”^{[2] VI:235}。裨治文于1835年5月发表的《中国教育现状》一文中对中国教育历史的发展与现状进行了简要的概述,他认为中国长达数千年的教育史中“世界历史与地理精密的自然科学和纯文学完全被忽视”^{[2] IV:4}。他指出:“毫无疑问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反对正确

的教育和真理与知识的传播”,造成的结果是“中国人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进步微乎其微”,“天文学史几乎空白”,“对地理学涵盖的基本准则一无所知,居然凭借臆测确定地理位置”^{[2] IV:14}。中国在道德观念和伦理思想方面的教育“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退化,这是由本质上存在缺陷的制度所导致的一种自然的、无法避免的后果。在道德方面中国从来没有站在高处。而且,随着中国目前状态的延续 这个国家将永远无法离开原地走出多远”^{[2] IV:9}。

他们秉承的教育观就是以西方教育批判中国古代传统教育。自1835年7月开始,《丛报》陆续刊登了裨治文译介的蒙学典籍。在这些文章中,裨治文对中国古代基础教育作了诸多负面评价。在《三字经》的译后评论中,他指出,“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天朝没有为孩子们准备一部更优秀的书籍。《三字经》从始至终都难以理解,除非是对语言知识掌握谙熟的人。有许多适合少年心智的系列课文都比《三字经》要好。虽然此书的确文风浅白,语言纯真,但缺乏道德情操和宗教准则,未包含任何一词来引导儿童的思维,使之超越时空与感觉。全书看不到天父、创造者、主宰者及人之不朽等字眼,学生们在通往永恒的道路上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行”^{[2] IV:118}。对《千字文》《孝经》的译介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要改变这种现状,他们认为必须走以西式教育改造中国的道路。但是,这种有益的变革必须经由外国的机构来进行,或者,至少通往预期效果的原始动力应该来自国外^{[2] IV:9}。

综而观之,这些传教士对儒家典籍的译介意在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根基及中国人核心思想的来源,并达到批判、贬低中国古代基础教育的目的,从而为传播“福音”做出必要的准备和铺垫。

二、儒学典籍的译介特征

(一)译前导言:拟译文本纲领性的介绍

导言通常能够体现出译者对译本来源文化知识体系的把控情形,译者在此常常以正面方式现身,对所译文本做介绍、评价。《丛报》在所译介的儒学典籍译文前都添加了长短不一的导言,内容或是对所选译本底本的评价,或是对内容的简要介绍,或是提示典籍的主题。

裨治文将《三字经》的题名翻译为“*Santsze King, or Trimetrical Classic; its form, size, author, object and style; a translation with notes; the work ill*

adapted to the purposes of primary education”。从题目的翻译和解释可知译文为注解式翻译,会涉及形式、作者、风格,且裨治文对作品初步评价为“不适合初级教育”。他在导言中首先介绍了三种底本,即《解元三字经》《三字经注释》以及由王伯厚编纂、王晋升注解的《三字经训诂》,也就是裨治文参照的底本。针对排版特点,他指出,“中国的书籍和希伯来书籍一样始自右方,但文字并非自右向左横排,而是自上而下竖排”^{[2] IV:106}。在对汉字数量、音律进行简要介绍后,译者肯定了带有注解的版本使用范围更广泛,也更简明易懂。而后,裨治文翻译了王晋升的序言,阐明该书“语言易解、风格简明”,“是对历史和经典文献了解的一把钥匙”,“有助于少年形成良好的习惯等”。他评价道:“这本小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使本国年轻人修习语言,通过韵律加强记忆,吸引注意力。中国所有省份都使用该书,它是儿童开始修习阅读的第一本书。”^{[2] IV:106} 正式译文前就翻译特点,他补充说“就其主题和文体,我们的译文细读之下适理解。我们保留了原文的两句一行的特点,但未尝试将译文韵律化”。裨治文还总结了《三字经》的主题(argument),为西方读者阅读理解提供了便利:“人之本性;教育的必要和模式;孝道和友善的重要性。数字;三才;四季;五行;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所应学习的文化课程及书目。根据朝代更迭顺序叙述历史。从先朝贤人、政治家的行为及个人旨趣、家族荣耀方面激励大众读书学习”^{[2] IV:106-107}。

在其他典籍的正式译文前也多有类似的评价,如在第四卷《孝经》的题名译为“*Heaou King, or Filial Duty; author and age of the work; its character and object; a translation with explanatory notes*”,以此可知译介将涉及作者、成书年代及特点等,并会为译文添加注解。其后的导言内容首先概述了《孝经》的主要内容,即“主要为孔子所言”,“是他与弟子间的对话”,继而简要说明译文所参考的三个版本,并指出该书宗旨是“提高天下所有人的道德水准并对其加强治理”。而且,“由于篇幅所限,有些地方无法添加注解,建议读者参考原著的解说和注释”^{[2] IV:345}。

第四卷第五期在《千字文》的翻译前,也添加了详细导言,题名被翻译为“*Tseen Tsze Wan, or the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its form, size, object, style and author; a translation with notes; new books nee-*

ded for primary education of the Chinese”。译介文章诚如其名,从《千字文》的格式、长度、目的、风格、作者、翻译和注解以及中国初级教育呼唤新书的观点一一展开。文章开头就肯定了该书和《三字经》《百家姓》几个世纪以来的影响,其主题就是“人”和“责任”,随后总结其排版和韵律特点:“最独到之处是不重复用字”,且从中可见“汉语同英语相比,很少使用虚词”。此外,还简要介绍了《千字文》的成书经过。正式译文前同样给出了该书的主题,提示每部分主要内容,便于读者抓住文章主旨^{[2]IV:229-230}。

总之,儒学典籍的译介中,译者将导言作为联系翻译文本与研究成果的最佳载体,通过发挥其主体作用对译文的语言文化语境进行主观构建,对翻译文本及其牵涉到的文化元素提供简明、清晰的介绍,为译文构建出丰富的语言文化语境,阐释出译入语所涉文化背景,使西方读者对拟译文本有了初步认知,以达到易解的目的。

(二)译后注释:中国文化知识的传播和评介

注释是古代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字经》《千字文》的译介也包含不少译后注释的内容。注释是译者显身、介入翻译的方式,通过注释译者往往可以解读内涵、加入评论,以显身的方式传达见解,与读者展开交流。译后注释既可以帮助读者消除语言文化带来的障碍,了解原作的微意,亦可以阐明译者自身的观点。

《丛报》儒家典籍译后注释的作用大致有两类:一是解释评论型的。即选译中国学者的注疏,解释典籍的内涵,使其清晰可解。同时,不乏夹杂着译者对原作的褒贬臧否,阐明对中国教育的观点。《三字经》译文后,选择原文的56句注释加以解释,其中既引用王晋升本来的注解以及孟子、孔子等中国古代圣贤的名言,也有译者自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例如,“性相近,习相远”注释中引用孔子《论语》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观点。“人之初,性本善”的注释中引用《孟子·尽心上》中的“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敬其兄也”,阐述人性本善的观点。同时,裨治文评论道:“这里提出的有关人自然天性的主张与人的通常行为很不一致,以至于一些中国的道德家们完全否认其正确性,认为有些人天性就是好的,有些就是坏的”^{[2]IV:111}。诸如此类对中国文化的贬损在《千字文》的译后评论中也可见到:“此书的编纂并不适合教育的目的。儿

童或成年人除非是在不情愿的状况下,才有可能拿起此书,他们认为学习它是一项令人厌倦的任务。《千字文》,不论从其原文还是译文来看,都有必要为初等教育提供新的教材。”^{[2]IV:229}可见,译者正是借助其译后的评论性注释达到批判以儒家学说为根基的中国基础教育体系的目的。另一类注释是文化普及的,也就是对译文涉及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给与必要的补充。如《百家姓》译介文中除翻译部分姓氏外,针对西人不了解的中国姓名文化做了细致的补充,重点介绍了“姓”的起源和“名”的分类:幼名、书名、官名、字、号、国号和庙号^{[2]V:84-85}。对它们的取法背景、缘由、命名的时间等逐一进行了介绍。而后,译文又以中国家族等级分层为主题,对中国家族亲属关系,如夫妻间、父子间、兄弟姐妹等称谓知识做了详尽的补充和说明。《小学》的译文后,亦有对翻译文化知识的补充,如在《立教》篇的译介后,译者对“塾”在正文直译为“school-room”,译后的注释中补充“古时,居住在一起的25家形成一间,其中儿童接受教育的地方称为塾,也就是学堂”^{[2]V:85}。“党”也是先直译为“academy”,解释为“当聚居的家庭数量达到500家时儿童受教育的地方”等。另外,针对中国的古代教育文化知识做了必要的背景介绍,指出:“最低层次学校称为小学,儿童八岁入学,学至十五岁,而后才被允许进入高一层次的教育机构。”^{[2]V:85}这些内容考虑到了英语读者的求异心理,同时又将传统中国教育文化传递给他们,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得以保留。

三、儒学典籍译介的传播和影响

(一)传播概况

在20年的发行周期内,《丛报》仅在1836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披露过其销售量。该文统计可见,《丛报》1836年的销售量和流通地区为:中国(200份)、美国(154份)、英国(40份)、巴达维亚(21份)、新加坡(18份)、马尼拉(15份)、三明治群岛(13份)、孟买(11份)、孟加拉、尼泊尔和阿萨姆(7份)、马六甲(6份)、槟榔屿(6份)、悉尼(6份)、汉堡(6份)、开普敦(4份)、泰国(4份)、缅甸(3份)、锡兰(2份),共计515份。从以上数字可见,尽管发行总量不多,但流传面却相当广泛。从销售地区看,主要集中于两大区域,一是亚洲,二是美国和欧洲。

此外,《丛报》1837年1月刊曾披露其时在华

西人为 307 人,由此可知,1836 年到 1837 年间至少三分之二在华西人为《丛报》订购者。从 1816 年到 1851 年,整个英国有关中国的书籍仅仅 36 本,1801 年到 1852 年间英文书目所列有关中国书籍合计为 42 本^{[5]106},《丛报》向两国出版社和教育机构都提供了大量的赠刊,成为英美两国关于中国最有价值、最可靠的信息来源之一。当时一些著名的刊物,如《北美评论》《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发行量也不足 3000 册。20 年间《丛报》出版总数为 21000 卷,平均每年约合合订本 1000 卷,每期平均发行 800 多册,可以说,《丛报》的发行量相当可观。有学者统计,《丛报》在世界各地发行期刊上征引、转载过的文章达到了八十多种^{[6]45}。截止到目前,根据世界上最大的文献信息服务机构线上联机图书馆中心,即 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的统计,全世界有 3000 多家图书馆收藏了《丛报》,可以说几乎涵盖了世界所有主要图书馆,其传播和刊行具有世界意义。

(二) 建构负面中国形象

翻译理论家西蒙认为,“译者的主体性必须理解为译介活动的复杂过程的一部分,这种活动为译者积极的和批判的干预预留了空间”^{[7]35}。作为新教传教士出身的《丛报》译者,他们对文本的诠释和理解受制于其基督教意识形态,评判中国古代初等教育的选材、方式,含有对中国经典颠覆解构之意,是为传播基督教扫清道路的必要举措。他们在译前注释和评论等副文本中进行知识管控和操纵,以显身的方式频频对儒家思想和文化进行批判和指责,着力展现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古代文化和教育体制的“低劣”之处,他们的点评对建构一个文化思想基础低劣、亟需唤醒并接受神的指示的中国形象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 典籍西译之桥梁

与此同时,必须承认的是,《丛报》译介的儒家典籍在中学西传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孝经》和《小学》都是借助《丛报》首次进入英语世界的,可谓首创之功。此后的 1879 年,理雅各在参考《丛报》译文的基础上,在其出版的《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第三卷再次译介了《孝经》。他在译文注解中多处评点裨治文的翻译,从宗教比较领域进一步诠释了对《孝经》的认知;《三字经》的译介则承接马礼逊的译本,下启德国汉学家欧德理(Ernest Johann Eitel)和英国汉

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的译本,是《三字经》中学西渐的重要一环。1841 年,裨治文在澳门由 S. Wells Williams 出版社刊行出版了他编辑的《广东方言中文文选》(*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一书。该书也收录了他的《三字经》英译文,但页面排版与所载版本不同,内容上考证了历代中文《三字经》的不同版本及历史演变,对后来《三字经》的译介者在选择源语版本方面具有启发意义。

儒学典籍译介作为中国文化译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人认知中国的有效途径。《丛报》的译介凸显出传教士译者主体操控的结果,翻译文本印证了背后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其译介过程是中国文化知识和中国形象在异域经由翻译渗透和重构的过程,其目的是为颠覆中国传统文化基石,进而推动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进行铺垫。但作为中国文化外化的渠道,《丛报》的译介构成了 19 世纪西方关于中国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客观上对于推动中西文化间的交流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本文引用原始史料较多,为行文方便,采用缩写代表卷数和页码,例如,“1:3”代表《丛报》第 1 卷第 3 页,以此类推。)

参考文献:

- [1] 张西平.《中国丛报》篇名目录及分类索引[M]. 顾颖,杨慧玲,整理.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2] Bridgman, Elijah Coleman, Williams, Samuel Wells ed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M]. Macao, Canton: 1832 - 1851.
- [3] 陶飞亚. 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4] Barnett & Fairbank.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5] 宋莉华. 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6] 尹文涓.《中国丛报》研究[D]. 北京:北京大学, 2003.
- [7] Simon, Sherry.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下转第 48 页)

